

# 顾颉刚与《古史辨》

赵光贤

清乾嘉间，崔述积三十年之力写了我国唯一的一部科学的古史《考信录》，幸而有学生替他刻书，书总算保留下来，但很少人知道他。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得到一位真正的传人，那就是以编《古史辨》而扬名四海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学问渊博，兴趣广泛，除了古史之外，对于歌谣、传说、沿革地理等等都有撰述，这篇小文只谈顾先生的主攻方向辨伪史和他编的《古史辨》。

## 一、顾颉刚的读书癖与疑古癖

顾颉刚于1893年生于苏州。顾氏自三国时代以来即为吴中大姓，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得祖父与父亲之教，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一位大学者不是为奇的。他在十岁以前就读了《孟子》、《诗经》、《左传》等。奇的是读书时不同于一般孩子，书上怎么说，他就怎么信，而是会提出疑问，比如读《纲鉴易知录》时，他提出这样的疑问：

书“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书“秦王薨，子楚立。”下目书曰：“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年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书三日而薨耶？此史官之讹也。

他批评“史官之讹”是错的，他自己也发现了，因孝文王即位在他除丧之后，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冲突的。虽然批评错了，但这种敢于怀疑的精神不是一般初学能有的，那时他才十一岁。

一个很年轻的人读书能有这样的细心和疑问，决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做到的。这只能归之于天赋。顾先生之所以成为煊赫一时的大史学家，决不是偶然的。

顾颉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认真读书而又能实事求是，凡是他认为可疑的说法，一定要穷追到底，找出真相，在这一点上他和崔述非常相似。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者之秀……

这大约是他1914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写的。这的确是个“宏愿”，但这志愿太“宏”了，事实上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他虽然未做到，但其志可嘉，有几个读书人敢有这样的宏愿？他后来对古史研究上确是走这条路的，因此而有《古史辨》的编著。

他这个宏愿是从何处做起的呢？他从目录学做起，想按时代的先后来分类。他这样说：

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因为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想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大概的分法是，周秦为一时代，两汉为一时代，六朝又为一时代…再从周秦时代中分为经（如《诗》、《书》），

传（如《易传》），记（如《礼记》），纬（如《乾凿度》），别经（如《仪礼》），别传（如《子夏易传》），别记（如《孔子家语》），别纬（如《乾坤凿度》）等。…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的观念而没分科观念的，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轨范的可以好一点。

根据这个想法，他在1915年回家养病时，以《书目答问》为线索，作了一部《清代著述考》，共二十册。他说他在做这种工作的体会是：

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由此他懂得清儒在治学上超越前代绝不是偶然的，他要向清儒学习，不仅要作《著述考》，而且要作《国学志》，想把材料和文章分类抄录，还要把过去的学者听作为古书所用的学术名词作成辞典式的解说，把清代著述考扩大为历代著述考和学术年表。虽然这只是计划，可从这宏伟的计划中可以看出他的向学的决心，他要把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学术上。后来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其实对一个真正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这种“野心”和“夸大狂”的产生并非胡思乱想，但他终于认识到：

研究的工作仿佛是一堆土，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加]扩大。固然堆得无论多高，总不会有扞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天天去加高一点却是做得到的，…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箕一箕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们的本分的事业。

后来顾先生的考辨古史的工作确是这样做下去的，我想一切真正研究学问，而不是以学问为沽名钓誉或做为向上爬的敲门砖的人都应当这样做。

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录之如下：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象，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为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佈。…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以可使它少偏一点。……

我相信顾先生这话是很真实的，他和钱玄同一样，原来都想以客观的态度来谈古史或古书，但这很难，越是有学问有见解的学者就越难，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所愿接受的是真实的，而对不愿接受的总认为不真实的。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会陷于一派之中而不能自拔。钱玄同也是如此而更加甚，此荀子之所以作《解蔽》篇也。顾先生主观上不想加入任何派别，结果却被人称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的首领，这恐怕是他料想不到的。

其实顾先生研究古史的目的并不在于疑古，而在于建设一个其实的古史，疑古不过是一个手段，这和崔述作《考信录》一样，考而后信。不过因为我国古代的伪史伪书实在太多，用去了他毕生之力还未作完。当他在北大毕业后，在研究所国学门作助教时，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为之欣喜不置。他说：

……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份，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遗籍、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

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文的系统上致力罢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他的疑古辨伪工作只是为建设真古史扫清道路。我们从他去世后由王煦华同志整理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也在从辨伪走向求真的道路，所以一般人称他为疑古派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也不是完全不正确，因为他疑古的确比一般人大胆。

以上所说明顾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他的理想，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正确地认识这位伟大的史家的真面目。（本节引文皆出自《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

## 二、疑古思想的来源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虽说是从小时就有的，但发展成为他的治古史的中心思想则产生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综括起来看，他的疑古思想的来源或者说所受疑古最大的有三方面：

### 1. 过去学者的疑古思想

我国历代都有些能独立思考不迷信前人旧说的，如唐代的刘知几、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一直到清初的阎若璩、胡渭、万斯大等，但多是就一书或一部分做些辨伪工作。从明代开始有合众书辨伪的，如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初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这些书对顾先生当然都有不小的影响，后来他印行了《辨伪丛刊》把这些东西都收进去。据他自己说，他作《古史辨》的指导思想的来源，在古人里主要是郑樵、姚际恒和崔述，实际上以受崔的影响为最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谈谈崔述对他的影响。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贤按，此书全名《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们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的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已经辩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可是我们对于崔述，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也难怪他，他生长在理学的家庭里，他的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们现在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是不很难的，所难的只在许多制度名物及细碎的事迹的研究上，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

从这段话里可见顾先生对崔述的著作是多么喜欢，因为崔述对古史（只是先秦史）的辨伪工作是前无古人的、系统的、用科学方法作出的著作，等于为顾开辟一条道路，所以他下决心用好几年的工夫把崔书加以标点，准备印行。但他对此还不满足，大约过了十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和燕大同事亲赴河北魏县崔述的故里去采访，又得到崔的夫人成纫兰的诗集，他的弟崔迈的著作等等，于1936年在亚东图书馆印行，名《崔东壁遗书》，这是崔述遗书最完善的本子，此书于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顾已去世，乃由其弟子王煦华改编者，与

亚东本详略不同。

顾先生称赞崔述没有门户之见，这点也很重要。他引崔述的话说：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学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过多不始于宋儒，宋儒罪非，汉儒安得尽是？理当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顾先生说“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本来门户之见非学者所应有，清入宗汉而排宋，宋儒说东，清儒必说西，往往吹毛求疵，自陷于谬误。崔述虽出自宋学，但并不为左右袒，对朱熹所说有认为非者，亦必指出，的确毛汉宋门户之见。对于汉儒亦如此，不问今文、古文，以是非为准，这点确是一般儒者所不及的。

顾先生虽然认识到崔述的这个优点，他在主观上也想学崔述，但可惜未能提高警惕，终于落入宗派的圈子里。

## 2. 西方史学思想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也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汹涌进来的时候。恰好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新旧兼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此年冬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聘为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诗经》讲起，顾先生认为胡有新见解，约傅斯年等人去听课。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风行一时，顾、傅等人联络一般思想较新的同学，创办杂志，取名《新潮》，同时黄侃等守旧学者出版《国故》，以相抗衡。此时胡适也倾向疑古，时与顾颉刚通函讨论，并询姚际恒的书，介绍崔述的《考信录》，商量出《辨伪丛刊》。同时还有钱玄同也是疑古派，与颉刚志同道合，往复通信，俱见《古史辨》中。胡适作《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对顾先生影响很大。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有下列话：

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有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若不经他的考证，这种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论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由此可见，他受胡适的影响是很深的。除胡之外，还有一位钱玄同，钱与顾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比顾的疑古更大胆，他甚至于废钱姓，改名疑古玄同，这也真是学术史上一件趣闻。关于钱的思想，看《古史辨》即可清楚，后来钱和顾走到同一条道路上去，决不是偶然的。

## 3. 清末今文学家的影响

清代自嘉道以后，内受太平天国的打击，外受列强的侵略，国势日益衰落，于是有些学者利用公羊学作为改革的论据，出现了好些今文学家，其中最有影响是康有为。他为实行变法找理论根据，把孔子抬出来，作《孔子改制考》，以避免保守派骂他用夷变夏，大逆不道。他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都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政治论著。但由于他大胆疑古，遂为顾钱所接受，对他们的影响很大。顾先生最初是古文学家章太炎的信徒，后来见到

康有为的书，由于康氏大胆疑古，就对康倾倒。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这样说：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讲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恹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此时顾虽对康表示敬意，但无意作今文学家，所以他说：

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我觉得他们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作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讖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

这个看法本极正确，可是后来主要是受了钱玄同的影响，竟滑到今文家的宗派里去，甚至承认《新学伪经考》是一部学术著作，走到他的原义的反面，真是太可惜了！

在这三方面的影响中，本来胡适和顾先生的关系是很密的，看《古史辨》第一册中两人的通信便知，可是后来，胡适忽然变疑古为信古了，这使顾大吃一惊；又因老子的时代问题，胡坚持老子在孔子之前，顾则同意梁启超的意见，认为《道德经》的成书当在战国时，如老子是此书的作者应当在孔子后，由此二人的友谊就断了。只剩下崔述与康有为两派对顾一直很有影响，但两派的作风决不相同，崔述虽受六经的束缚，但在辨伪考信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是真正的学者；康则以伪造孔子托古改制作为他变法的先例，以无中生有的手法，硬说汉代古文经都是刘歆假造的，来为今文学张目并打击古文学家，则是伪学者，顾先生对崔康二派一视同仁，遂走上错误的路子。

### 三、《古史辨》的成绩与特点

顾先生的成名之书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于1926年，由北京的朴社印行，第七册则出版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解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其中第一、二、三、五册是顾先生编辑的，第四、六册是罗根泽编的，第七册是童书业编的。

这七册的《古史辨》是集合各家辩论伪书伪史的论文集。它和一般论文集不同，是正反两面论战的论文、通信等的合编。其中针锋相对的论战最能引人兴趣，所以第一册出版后，令读者耳目一新，一年之中竟印行二十版，这恐怕是出版界所仅见的。争论中的主将是顾先生，以疑古为旗帜，书名《古史辨》，于是有疑古派与《古史辨》派之名出现于史学界。第四、六两书本为罗根泽编的《诸子丛考》，其中也有好多争论，顾先生认为与其它各册性质相近，因而也收入《古史辨》中。在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日亟，学者很难从事著作，顾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抗日宣传小册子，旋即南去，于是《古史辨》第七册交其助手留在上海

的童书业编辑，因论文太多，分为上、中、下三册。

《古史辨》第一册分上、中、下三编，而以中编为重点。其中第一篇就是顾先生写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原本刊在胡适编的《努力周报》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今收入《古史辨》里，前面加一小序这样说：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在这封信里，他本着上述观点，提出几个看法：1.《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

（《史记》里的帝尧、帝舜是后人的称呼不算）2.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3.禹和夏没有发生什么关系。4.禹是从九鼎上来的，根据《说文》，禹虫也。（贤按：后来顾先生否定了此说）5.到春秋时才有尧舜。6.黄帝之祀起于秦国，经过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7.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8.自从《易系辞》抬出庖牺氏（即伏牺氏），于是庖牺氏又在神农之前了。9.自从李斯等人说“有天皇、地皇、秦皇，秦皇最贵，于是三皇之说又立在庖牺氏之前了。10.自从汉代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三皇之前了（贤按：苗族的始祖传说当是庖牺氏，盘古当是瑶族的始祖传说）。总之，“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的好比喻。

此信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刘揆蓁、胡堇人的反对，正如顾先生说的“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双方交战，并无结果。平心而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始因受崔述的启发而提出的，原则上是正确的，郭沫若也赞它是“卓识”，并为多数古史学者所信从。《论语》记载古圣王只提到尧、舜、禹、稷，但并不称尧舜为帝，亦无为五帝中之二帝之说，因为古人以帝为神，人王在夏代则称为后，商、周都称王（殷末称帝乙、帝辛是例外）。我们从社会发展史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尧舜当是氏族社会中的部落酋长，所以连“后”号都没有，更谈不到为帝。《论语》既无五帝，更无三皇。由此推论，所谓伏牺、神农、黄帝、女娲等不过一种表示社会发展阶段的名称，多是战国以来才有的，更多见于纬书，其非信史是很易理解的。

《古史辨》第一册的主要争论问题在于禹是神还是人？双方争辩甚烈，但解决不了，因为在历史传说中，神可以变人，人也可以变为神。禹究竟是神还是人，各说各的理，都是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顾先生之所以被认为疑古派领袖，主要由于这个争论，而这类问题由于各家看问题的视角和思维逻辑的方法不同，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意见。

我以为顾先生的《答刘胡两先生书》的第一信（《古史辨》第一册99页以下）提出四个研究古史的观点很值得注意：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点对于我国古史研究中

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古以来的传统观点一般承认：古代帝王都是黄帝之后，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甚至认为尧、舜时代也是统一的；至于在于古代神化为人，虽不尽是这样，但确有这类事。（比如《左传》昭元年郑子产所说的高辛氏二子阏伯、实沈日寻干戈，于是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即大火），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夏星。这本是神话，并无其事。今人每认为历史，以商参二星为宋晋二国之星。）儒墨二家都承认尧舜为至德之世，递降为三王、五霸。法家韩非也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都是历史退化论，这显然是错误的。今人论史仍有犯这类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顾先生提出这四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过去一般人读书，往往是书上怎么说，就信以为真，跟着也怎么说，只是少数头脑比较清楚的才能看出书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提出种种疑问。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枝枝节节的，没有系统，第一个系统地对古史中的可疑之处提出来而加以辨驳的是崔述，顾先生继之作更大胆的辨伪，使读书的人头脑清醒些，好象中暑的人头昏脑胀，服了清凉药，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古史辨》就是读古书的人的清凉药。但是传统积习实在太重，他们迷信古人的成见太深，虽有崔述，顾先生的努力，收的效果并不大，迷信伪书伪史的人直到今天还不能清醒过来的，写文章公然引用伪书，屡见不鲜，可见顾先生的疑古工作不是作的太过头了。

#### 四、《古史辨》与今古文之争

头脑清楚的即令心细如发，能见人所不能见的地方，也免不了有疏忽失误之处。《古史辨》第五册中顾先生、钱玄同和钱穆之间关于今古文两派在刘歆伪造古文经传上的争论，即是一例。在此册中有三篇最重要文章：一是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是顾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是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及钱穆与顾先生互相批评的两篇。三人关于今古文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传的问题，如比较详细的介绍，非写一篇长文说不清楚，决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这里我只能略说大意。

上文已提到，顾先生虽很欣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所说上古史事荒远难稽，经传所说不能信，但也看到康的说法目的在于为其变法从孔子那里找理论根据，其中大引纬书最不可信，但后来和钱玄同来往较多，受其影响，不知不觉地跟着钱走了，也相信了刘歆伪造古文经传，是助王莽篡汉之说。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本是重印《新学伪经考》的序，序中说他之所以信康说是受当时北大教授崔适的教导，认崔为师，死心塌地跟着康、崔走。崔与钱的信说：“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其实康、崔并不懂考证，崔自比于惠定宇，而以康比阎百诗，实在是大言不惭。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书中最重大发明有二点：一是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二、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之事。其实，这两条都不能成立，康氏只会咬文嚼字，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儒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伏生既为秦博士当然他的书应不在焚烧之列。但他不懂，秦法严酷，伏生虽为博士，他能不怕官吏不管他是不是博士，见有藏书，就焚烧了，所以他要藏书在壁中，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其后兵大起，流亡”，是说农民起义，战事起来，伏生流亡到它地。”在战乱中，书籍遭殃，这是常事，所以“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这并无奇怪，康氏认为伏生既是博士就不用藏书，因而说，“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这未免太武断。如果真的未亡缺，为什么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汉宣帝时

得《太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说秦焚书，六经未尽亡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未尝”亡。康、崔于是说《儒林传》所记关于古文经的传授都是被刘歆增窜的，钱氏亦信之，但证据何在？钱氏说：“刘歆非说今文《尚书》为残本不可，于是不得不增窜《史记儒林传》，以为证据，初不料竟与《始皇本纪》抵牾也。”其实《儒林传》与《始皇本纪》并不抵牾，钱氏以书生一孔之见，盲从康、崔而又影响到顾先生。至于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认为这都是刘歆窜改，更是强词夺理，刘歆简直太神通广大了。

康氏为什么专和刘歆作对，硬说他伪造古文经？因为康继承清代今文学家之说，认为今文学家说才是孔子的真传，刘歆曾上书请立古文《左传》为博士，与今文《公羊传》为敌。他又曾任王莽的国师公，于是认刘歆的伪造古文经传都是以助莽篡汉为目的。一部《新学伪经考》就是为此而作的。崔适钱玄同等迷信康说，著书为之张目。但康说究竟有无根据，能不能成立？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于是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反驳，年谱前有一序，提出康说“不可通”之处有28条之多。大意是说，刘歆父刘向校书中秘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后刘歆也参加校书工作，绥和元年（前6年）向卒。次年诏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同年（哀帝建平元年）歆即上书争立古文经博士，距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计刘歆在中秘校书不过十余年，说歆在此期间能遍造古文经，是绝不可能的。何况向治《谷梁传》以说《春秋》，歆发现《左传》、“大好之”，父子间往往辩论，如歆伪造《左传》，向怎能不知，还和他辩论，向岂不太愚了？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又同时校书中秘的还有多人，如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斡、苏竟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歆怎能作伪？东汉诸儒如桓谭、班固、崔骃、张衡、蔡邕等都曾校书东观，目睹中秘书，怎不能发现伪造诸经的迹象？反对古文经者，前如师丹，公孙禄，后如范升等为何不揭发刘歆伪造古文经？这些都是说不通的。至于说刘歆伪造经典，目的在于助王莽篡汉，更是笑话。歆校书时在莽篡汉前十余年，他怎知莽要篡汉？他是汉宗室为什么要助莽篡汉？何况媚莽篡汉者根据是符命，符命源出灾异，言灾异者都是今文学家。康氏说歆助篡汉，主要根据《周官》一书，歆如果想助莽，为何不造符命，不言灾异，却伪造一部《周官》，而新莽官制又并不专据《周官》，如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凡此种种都足以否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使康说彻底破产。

为什么清代今文学家都说伪造古文经的是刘歆而不是它人？问题出在《汉书·刘歆传》上，歆传说：“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因此他们一口咬定《左传》中解经的话都是刘歆伪造的。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左传》中确实有后人所作解经的话，而且作者不只一人，但都是战国时人所作，而不是刘歆。歆传这句话的意义是说汉人讲《左传》的人只讲章句，不讲义理，刘歆和他的弟子郑兴研究《左传》，要讲义理，成他的一家之言，并准备有所著述，事见《后汉书·郑兴传》。钱玄同是学者，他应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应盲从康有为。

只要不受康说蒙蔽的人都不难发现，刘歆的话往往与《左传》抵牾，《汉书五行志》有许多条引刘歆的话，试与《左传》对比，全不相符。主要区别在于《左传》只讲天象对人有无灾害，刘歆则好讲阴阳五行，好讲符应，和董仲舒、刘向的思想是一个路子。又《左传》用岁星无超辰的历法，刘歆作《世经》则用144年超一辰的太岁纪年法，二者截然不同。崔钱诸人不作深入钻研，只看刘歆传上一句话，就把《左传》上解经的话一概说是刘歆的伪造，更由《左传》而遍及群经。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有疑问之处，只能说是疑问，并不是证



据。这种错误不仅自误而且误人。关于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的驳正详见拙作《左传编撰考》第五节（收入拙著《古史考辨》155—164页），这里只说大意，请读者参考彼文。

顾先生本来不信这些今文学家的，但后来受钱玄同的影响竟信了刘歆伪造《左传》之说，从而不知不觉地跟着今文学家走了。他作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前面用五德终始说讲五行说的起源和发展，但从十四节起就讲“今古文问题”了。他说：

《汉书》本传说他…“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见他对于左氏传是曾经动过一番手的。

这完全是今文学家的看法。又说：

刘歆从幼就受有很好的家学，稍长又博览秘府藏书，他也希望自己的学说立于学官，竟被他发明了一个新途径。秘府中的书当然有用古文写的，他就从这上面得到暗示，觉得倘在今文经书之外别出许多古文经书，一定可使经学界中开出一个新面目。所以他在三家诗之外，别出一种《毛诗》，在欧阳、夏侯《书》之外别出一种古文《尚书》，在大小戴之外别出一种《逸礼》，在公羊、谷梁《春秋》之外别出一种《左氏春秋》。这四种新经和新传都是以“古文”为标帜的。

从这段话看来，顾先生竟认为《毛诗》，古文《尚书》（按此指汉古文，非魏晋以来的伪古文）《逸礼》、《左传》统统是刘歆伪造的。而且设想出他伪造古文经传的心理，这不完全跟着康崔等人跑了吗？顾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刘歆有多大神通竟能在短短十余年中伪造那么多经传，而且是用古文写的？为什么不想想和他同时校书还有不少人，他怎能作伪而不被人发觉？为什么不想想他竟敢以伪书为根据上书责太常博士，说他们“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若心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真是理直气壮，毫不畏惧，作伪者敢这样吗？反之，博士们却不敢和他质对，不过骂他几句，名儒龚胜乃至“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伪造者这样厉害，博士们却这样畏缩，不敢大胆反击，这将如何解释呢？

我们再看看，康氏是怎样发现刘歆伪造古文经传的。他在《重刻新学伪经考》后序中说：

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者多矣，吾蓄疑久矣，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等，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世纂其业，乃翻金匱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君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按《汉书》所有者为《史记》所无，只能认为可疑，绝对不能作为伪造的证据。如这能算证据，那么《汉书·董仲舒传》中上武帝的三策，亦为《史记》所无，难道也是刘歆伪造的吗？何况《史记》记事并用今古文，引《左传》之处甚多，照康氏的说法，全是刘歆所窜入，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作为论证，这怎能算是考证？但是顾先生却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后来他在与钱穆答辩文中仍坚持这个观点，一直到他晚年仍不信汉古文《尚书》是真的，这和魏源的《书古微》就没有多少区别了，我不能不对顾先生深表惋惜。

（下转第5页）

明,中国是粟、黍及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他提出的这一认识,已为考古学的新发现所证明。

吕老据“益干启位,启杀益”,和“王帅师伐有扈,大战于甘”,“启独传子,故伐启,启伐灭之(有扈)”等史料,认为由母系到父系氏族制转变的那一次社会大变革,“在共属于一个联盟之内的人们之间,出现了流血斗争”。这里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关于这一“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是和平地完成的观点<sup>①</sup>。

基于殷代只掌握冶炼青铜技术就已跨入文明时代的事实,吕老充分考虑到莫尔根和恩格斯关于发明冶铁术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后指出,“铁的功用,它无异是文明时代的接生婆”,“青铜器在适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据世界范围内已揭示出来的新的事实,斯大林在此后四年,即1938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认识:“在奴隶制度下,……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sup>②</sup>。这里金属的含义,自然不仅指铁,也包括了青铜。

可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具体情况相结合,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实事求是地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是吕老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的方向。这体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可贵品质,也是他为中国革命进行史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

自《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问世后,于1940年和1962年先后再版,在这近六十年的岁月中,随着中华民族走过的几个时代,曾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影响了好几代学人,不仅在史学领域中,而且在相当广泛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中,起到了重要而巨大的作用。“立学高风世馨香,”是张爱萍、李又兰前辈为吕老逝世写的悼诗中的一句。这是对吕老一生的恰当评论。我以这句诗词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以永远怀念这位集革命者和学者于一身而为我等后学所崇敬的前辈。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初稿于北京小石桥,同年十月十三日修改于兖州六里井考古工地。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1—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sup>②</sup>《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上接第14页)

## 五、小 结

顾先生继崔述之后,打破六经的束缚,对关于古史的伪书伪史作一番清理的工作,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为郭沫若同志所称许。这个路子是对的,意义是重大的。但误信康有为的邪说,认他的谎言为考证,上了他的当,这是错误的,是不能为顾先生讳的。

建国以来,顾先生的主要工作是专治《尚书》,但因他写文章,有求全的习惯,总要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无遗,所有的问题都想解决彻底,于是每篇文章动辄几万字,乃至十几万字,这对研究者有方便处,但对一般读者则往往望而生畏。先生毕生研究《尚书》,未能写成一书,恐怕与此有关。现在他的学生整理其遗稿,陆续发表在《文史》上,刘起钊先生也在继续努力攻《尚书》,我们衷心希望顾先生的未竟之业终有完成的一天,所以在这篇小文里关于顾先生在治《尚书》的成绩只好付之缺如,留待专家去写了。

五十年代刮起一阵批判胡适之风,波及顾先生,当时对顾的批判都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说是违心之论。顾先生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写文章,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古史和对《尚书》的研究的功绩是人所共知的。不应因他主张疑古,或疑古过头就否定他的功绩。我这篇小文对于他在疑古工作的优缺点作了初步的评介,是否有当,请史学界同志们指正。